

文艺理论译丛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文艺理论译丛》编辑委员会编

3

7035519

文艺理论译丛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文艺理论译丛》编辑委员会编

3

中国文联出版社

文艺理论译丛(3)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北京建国门泡子河10号)

北京朝阳区展望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7.76印张 394千字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750册

书号：8355·409 定价：3.40元

目 录

- 美学初探(二) [德]梅林作 绿原译(1)
〔论古典美学〕 [德]梅林作 瞿光译(15)
论艺术 [德]卡尔·李卜克内西作 陈燊译(20)
资产阶级美学中关于和谐的人的理想
..... [匈]卢卡契作 章国锋译(46)
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 [匈]卢卡契作 李广成译(63)
〔论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
..... [民主德国]布莱希特作 达士营译(86)
-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节译)
..... [德]本雅明作 王齐建译(112)
现实主义与当代小说 [英]威廉斯作 葛林译(125)
马克思主义与美学价值
..... [英]伊裕尔顿作 王齐建译(146)
- 悲剧《浮士德》，歌德的作品(节译)
..... [俄]屠格涅夫作 张耳译(161)
席勒 [德]梅林作 韩耀成译(182)
初编《雪莱诗全集》序言
..... [英]雪莱夫人作 鲁汉译(198)
司汤达 [德]亨利希·曼作 张厚仁译(205)

·谈谈巴尔扎克创作方法的秘诀

..... [英] 卢伯克作 方土人译 (229)

谈谈果戈理 [俄] 列·托尔斯泰作 祝 融译 (244)

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

..... [美] 亨利·詹姆斯作 文美惠译 (247)

略谈奥斯特罗夫斯基君的新喜剧《穷新娘》

..... [俄] 屠格涅夫作 朱宪生译 (257)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宝贝儿》跋

..... [俄] 列·托尔斯泰作 祝 融译 (269)

作家谈创作

英国小说中的真实坦率 [英] 哈代作 张玲译 (275)

小说科学 [英] 哈代作 张玲译 (284)

小说与诗歌集总序 (为1912年威塞克斯版作)

..... [英] 哈代作 张扬译 (289)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资料 (三)

存在主义 (下)

加缪论文选

前言 郭宏安 (298)

评让·保尔·萨特的《恶心》 (1938) 杨林译 (302)

评让·保尔·萨特的《墙》 (1939) 杨林译 (306)

西绪福斯神话 (1943) 郭宏安译 (310)

荒诞的推理 (301)

荒诞与自杀 (311)

荒诞的墙 (316)

哲学上的自杀 (331)

荒诞的自由	(350)
荒诞的人	(362)
堂璜作风	(365)
喜剧	(371)
征服	(377)
荒诞的创造	(383)
哲学和小说	(383)
基里洛夫	(392)
没有前途的创造	(400)
西绪福斯神话	(404)
附录：弗朗茨·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与荒诞	(408)
尼采和虚无主义(1951)	郭 强译 (419)
反抗与艺术(1951)	冯汉津译 (435)
瑞典演说(1957)	郭宏安译 (463)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日的演说	(463)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四日的演说——艺术家及其时代	(468)

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及其代表人物评介（三）

存在主义……[法]埃斯卡尔皮特、奥利埃作	吴岳添译 (487)
文学中的存在主义… [苏]维里科夫斯基作	郭家申译 (493)
阿尔贝·加缪…… [法]吉奈斯蒂埃作	施 益译 (503)
阿尔贝·加缪…… [苏]叶夫尼娜作	白嗣宏译 (515)
阿尔贝·加缪…… 查·莫莱尔作	刘明正译 (544)
西蒙娜·德·波伏瓦 ……厄·马克斯作	邓俊秉译 (553)

编后记 (555)

美 学 初 探(二)

〔德〕F.梅林

绿 原译

二 〔歌德与席勒〕

译者前记 梅林在本篇中探讨了歌德和席勒的差别。关于歌德，他首先复述了恩格斯（文中作“马克思”，下同）对这位诗人的两重性的评价，这个评价是我们都熟悉的，即歌德有时是个“伟大的诗人”，有时又是个“渺小的庸人”，他没有战胜“德国的鄙陋”，而是“德国的鄙陋”战胜了他。梅林认为，恩格斯要不是为了同格律恩论战，他对歌德的评价会写成另外的样子。于是，他从身世、气质和创作方法等方面对这两位诗人进行了对比。一个是直觉型的，是从个体到理念，与任何哲学探讨格格不入，包括康德哲学在内；另一个是思辨型的，是从理念到个体，在成为康德派以前就是一个康德派了。因此，本文的批评对象斯坦纳，试图从哲学意义上阐释歌德的世界观，便不得不以失败告终。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两位诗人的社会地位截然不同。当歌德风华正茂，带着心爱的姑娘陶醉在无往而不美的世界梦幻里，对于法国唯物主义“象遇见幽灵一样吓得直往后退”的时候，青年席勒正在《强盗》中拿起锐利的唯物主义武器同现行的社会制度作战。当歌德从七十到八十年代正在一个小官庭里消闲解闷的时候，席勒正在为满足起码的生活需求而苦斗。

然后，梅林以主要的篇幅介绍了席勒的哲学思想面貌。他说，席勒的思辨天赋是与他少年时期的革命义愤同时存在的；《强盗》的作者即使对“德国的鄙陋”作了绝望的战斗，他却始终能够在康德的哲学中得到满足。不过，席勒决不是为哲学而哲学，他是在为资产阶级的“理性权利”、“理性国家”而奋斗。他在康德哲学的武装下，反对“扩大所有权”，反对“人屈从于暴力”，主张“平凡卑贱事物在艺术中的用途”，发现“处境卑贱加上意识尊贵毋宁可以转为崇高”，等等。但是，席勒并没有因此而把艺术和道德、政治混为一谈；相反，他强调美的自在性，不赞成在美的事物中要求道德目的，甚至宣称“大师们的艺术奥秘在于以形式消灭内容”。席勒之所以强调美，反对混淆美与善的界线，是出于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即美学教育对人类品德间接地产生有利的影响，可以维护和发展资产阶级的“理性权利”，因此他要求通过美学问题解决政治问题。这些观点充分反映在席勒以“审美国家”为最终目的的《美育书信》中。至于资产阶级理性半途而废，“沉溺于资产阶级利润”，根本忘却它的启蒙时期的初衷，梅林认为，那可不是席勒的过失。柏林狄茨版编注指出，梅林在本文中对席勒的一些看法，如认为席勒决没有“逃避”到康德的理想中去，后来在他的《席勒传》的前言中得到了修正。事实上，后来的研究者认为，“德国的鄙陋”不但战胜了伟大诗人歌德，同样也战胜了伟大民主战士席勒，他之乞灵于美学教育，仍然不能不是向诗、向康德理想的“逃避”。

总之，梅林的这篇评论，译者认为，可以从几个方面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一、对于歌德，除了认识他身上的“伟大”和“渺小”的两重性外，更应当探究一下他的“直觉的”、“从个体上升到理念”的创作方法，这样才能“从内而外”地理解他的“双重性”，并能从他的艺术创作受到更多的教益。二、对于席勒，除了认识他身上的康德影响外，更应当了解他的身世、他的政治理想，以及二者对于他的艺术创作的关系，这样才能从他的作品受到更大的鼓舞。三、至于恩格斯所说的“席勒化”问题，梅林在本文中并未涉及。恩格斯把创作方式分为“莎士比

“亚化”和“席勒化”两种，劝告作家弃后者而取前者，这个教导在理论上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对此应有如实的深入的理解，不宜将所谓“席勒化”和常见的以“艺术手段”直接为“政治目的”服务的“概念化”划等号。事实上，席勒的诗歌和剧作都各有其以哲学思想、政治理想为基础的艺术特征，如果一概视之为“概念化”而拒绝学习，就未免甚至见笑于买椟还珠者流了。

* * *

（评鲁道尔夫·斯坦纳：《歌德的世界观》，魏玛，1897，艾米尔·费尔柏出版社；弗里德里希·阿尔培·朗格的《席勒哲理诗导论》，载艾恩贝克首席教师O·A·艾里逊所编朗格遗著集，比勒费尔德及来比锡1897年，韦尔哈根·克拉津出版社）

卡尔·马克思^①曾经在一份几乎完全绝迹的四十年代某报上论述过歌德和席勒对于康德的态度。这一节文字颇有趣，值得超越本文的直接目的，稍为详细地复述一下。

马克思这样写道：

歌德是按照双重方式对待他当时的德国社会的。有时他对它怀有敌意，设法逃避他所厌恶的一切，如在《伊菲根尼》中以及在意大利旅行中，他象葛茨、普罗米修斯和浮士德一样反抗它，象梅菲斯特一样极尽挖苦嘲笑之能事。但有时他又对它很友好，如在许多“温柔讽刺诗”和许多散文中那样迁就它，如在“化装游行”中那样颂扬它，特别是在所有论及法国革命的文章中，甚至还卫护它不受咄咄逼人的历史运动的干扰。与

① 梅林所指的这段文字不是马克思写的，而是摘自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上的连载评论《诗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柏林狄茨版编注

他不以为然的方面相比，歌德所赏识的德国生活方面不是个别的。他的心情经常变幻不定；他一方面是天才的诗人，受不了环境的鄙陋，另一方面是小心翼翼的法兰克福议员的公子或魏玛公国大臣，又不得不同这种鄙陋保持休战并努力适应它，这两方面在他身上持续地斗争着。所以，歌德有时是伟大的，有时又是渺小的；有时是挑衅的、嘲弄的、蔑视世俗的天才，有时又是谨小慎微、自满自足、眼光短浅的庸人。此外，歌德也不能战胜德国的鄙陋，倒是德国的鄙陋战胜了他，而鄙陋对于最伟大的德国人的这种胜利，充分证明它一般是无法“从里面”来克服的。歌德是太广博了，太活跃了，太富于感性了，不能象席勒那样逃向康德的理想，来自拔于鄙陋；他明察秋毫，不会看不到这种逃遁终归不过是以平庸的鄙陋换取夸饰的鄙陋而已。他的气质，他的精力，他的整个志向指引他走向实际生活，而他所发现的实际生活却是糟不可言的。一方面处在不得不鄙视的生活天地里，另方面又为这个天地所束缚（这是他唯一能够有所作为的天地），歌德于是发现自己永远陷于进退维谷之中；人越老，强有力的诗人便越是退缩到渺小的魏玛公国大臣身后了。我们并不按照伯尔内和门采尔的说法，责备歌德没有自由思想，而是说他居然一再地成为庸人；不是说他对于德国的解放事业毫无热情，而是说他当拿破仑冲刷最大的德意志马厩的时候，居然能够一本正经地从事一个最渺小的德意志朝廷的最渺小的政务和*menus plaisirs*（法语：娱乐）。

这些话是很有教益的，所以必须在这里所涉及的要点上详加解释一下。我想，马克思写这篇文章要不是为了论战，而是为了教导，他会写成另外一个样子。他当时是针对卡尔·格律恩的，此人在三月革命的前夕曾经在他的论歌德的破书里胡诌

了一通庸俗的唯心主义。不过，德国的唯心主义在十八世纪末叶看起来，完全不同于十九世纪中叶。

与席勒相比较，歌德在气质上当然是更广博些，艺术才具更丰富些，但并不因此更积极。席勒把歌德的精神风格称作直觉的，而把他自己的称作思辨的；歌德是由个体上升到理念，而他（指席勒）则是先有理念，再由理念下降到个体的。艺术天才能够适应两种精神风格，而且有同样积极的行动，不过直觉的精神风格远比思辨的精神风格更难以接近各种哲学探讨。事实上，歌德本人这样认为，他对于本来意义上的哲学毫无天赋；正如他曾经说过的那句意味深长的话，他不欢喜“普遍概念象柱柱一样围住”他。只是对于斯宾诺莎，他还有一层较深的理解，而且只是对于这位哲学家的一些伟大的基本思想，如一切存在事物的统一性，一切发生事物的规律性，精神与自然的同一性。歌德并不赞同斯宾诺莎的全部著述，对斯宾诺莎的“数学式的犹太教经师式的修养”则一无所知。至于康德的哲学，连它的基本思想都没有吸引过他；他充其量客客气气地、有时简直是老实不客气地躲开了它；他满怀对世界的愉悦感这样说过，康德用他的人性恶的学说亵渎地弄脏了他洁净的哲学外套。

所以，要按照任何哲学意义论述歌德的世界观，是一件非常冒险的行动，而斯坦纳却试图这样做，便不得不以失败告终。他的思路是，“在一个命定的瞬间”，任何一个年迈的希腊人都摆不脱对于人类感官的乖僻的猜疑，此后人类便为哲学上的唯心主义所苦，直到歌德重新建立起统一的世界观。斯坦纳主要是根据歌德的自然科学文章立论的，但却得出了这样的答案：歌德从来没有直接经验过解放行动，他诚然会运用最高

级的认识方法，但却没有观察过自己。很难说斯坦纳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一首赞美诗提供了唯一的明显的指南——马克思·斯蒂纳^①；最后，读者得到这样的保证而获释，说是歌德如果建立了一个哲学思想大厦，他也会象黑格尔一样陷于土崩瓦解的。因为斯坦纳把歌德的一部分自然科学文章印成了大型的魏玛版本，你将怀着若干期望打开他的著作，但又一定会完全失望地把它关上。

然而，歌德和席勒对于哲学的不同态度，不仅取决于他们天生的气质，至少还同样取决于他们的社会地位。歌德作为“法兰克福议员的公子和魏玛公国大臣”，属于统治阶级，他对德国鄙陋状况的反抗首先是一个天才艺术家对一种沉闷得难忍、卑屈得可怜的庸人生涯的反抗；即使他反抗，他对社会现状也丝毫无所震撼。席勒则不然，他从儿时起就颠沛流离，不得不在卡尔军校过一种见不得人的奴隶生活。当年轻的歌德在斯特拉斯堡阅读著名的法国唯物主义宣言——霍尔巴赫的《自然体系》（里面吹刮着法国大革命的烈风）时，他觉得它“那样灰暗，那样不见天日，那样虚无缥缈”，以致象遇见幽灵一样吓得直往后退；他觉得这是“衰老的真髓，淡而无味，甚至变了味”。他在这个“阴郁的无神论的午夜”里感到十分空虚，大地及其万物、天空及其星辰都从这里消失了。具有创造精神的艺术家兼法兰克福贵族之子就是这样感觉的，他这时恰好带着一个心爱的姑娘闯出了社会等级的底层。而席勒在相同的年龄，却是怎样在《强盗》中拿起锋利的唯物主义武器同现行的社会制度作战啊！

^① 马克斯·斯蒂纳（1806——1856），德国哲学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狂热鼓吹者，1845年出版哲学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

在两位诗人的一生中，他们的伟大的少作之后都有过一段间歇期，仿佛田亩为了下一次丰收而养精蓄锐一般。歌德从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在一种消闲解闷的宫廷生活里度过了这段时光，而席勒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正在为筹谋起码的生计而苦斗。作为诗人，他们重新找到了自己：歌德是在意大利的旅行中，席勒则是在康德的哲学中。但是，歌德正如马克思的中肯说法，他通过意大利的旅行“逃离了他所厌恶的一切”，而席勒却决没有“逃避”到康德的理想中去^①，反之他热情地掌握了它，因此对待德国社会要比歌德“积极”得多。

从某种意义来说，席勒在认识康德哲学之前就已经是个康德派了。当被折磨的诗人在青年时期剧作中对令人窒息的生活情况发泄革命义愤时，他的思辨天赋同时活跃在一些诗作里，以动摇不定但却明显可见的轮廓暗示了康德的理念世界的发展层次。在《情欲的超脱》（Fregeisterei der Leidenschaft）一诗中，感官世界起而反抗清规戒律的冷酷无情；在《断念》（Resignation）一诗中，伦理领域胜利了，当然只是这样胜利的，即放弃德行在来世的报答，对于所有原来期望这样一种报答而被骗掉感官享受的人们，几乎显得是讽刺；在《艺术家》一诗中，“人的尊严”则专注于艺术。这些酝酿着的思想，席勒发现它们在康德那里，是以一个庞大的体系从内部滋生出来的，但《强盗》的作者即使对德国的鄙陋作了绝望的苦斗，他仍然能够在康德的哲学中得到他的满足。如果说席勒并没有作为哲学家接近过康德，那么他更具有“积极的性格”，足以按

① 参见前注。这个观点后来为梅林所修正。他在其席勒传的二版前言中明确表示信奉恩格斯的观点。——柏林狄茨版编注

照自己的方式来臆测老师了。他从康德的自然领域造出了自然国家，来指他当时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并从康德的人的意志自由领域造出了“真正的政治自由的大厦”；正如康德把艺术领域建立起来，作为联系自然领域和自由领域的中间环节一样，席勒则希望从自然国家通过美学教育的桥梁到达资产阶级的理性国家。

席勒在美学论文中首先同康德展开辩论，这些论文十分鲜明地得出了资产阶级的理性权利的结论。且来几次检验吧。在论素朴诗和感伤诗的文章中，是这样写的：“这样扩大所有权，一部分人会因此而破产，从实质上说是没有根据的。”在论崇高一文中是这样写的：“人没有比忍受暴力更不象人的了，因为暴力取消了他。谁将暴力加在我们身上，谁就使我们变得无疑比常人更渺小；谁懦怯地忍受暴力，谁就抛弃了他的常情。”而在关于平凡卑贱事物在艺术中的用途一文中则这样写道：“奴役是卑贱的，但自由中的奴才意识是卑鄙的；然而，从事奴役而没有奴才意识却不是卑鄙的，处境卑贱加上意识尊贵毋宁可以转为崇高。”此外，还有一些似乎针对当前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文章。

但并不是说，席勒仿佛因此把美学问题和道德或政治问题混为一谈了。自从尼采以一个荒唐而放肆的文字游戏发现席勒是“泽京根的道德吹鼓手”^①以来，每个少不更事的德国天才都认为以任何反对席勒的胡闹方式进入不朽的庙堂，乃是他们的光荣义务；但是，谁要是崇尚古老的风习，即在判处一个作

① 泽京根系联邦德国巴登—符腾堡州一地名，以浪漫主义诗人约·维·舍费尔的幽默叙事诗《泽京根的吹鼓手》而知名。尼采借用这个当时十分流行的作品名称，加上“道德”二字，讽刺席勒把美和道德混为一谈。

家之前才去读读他的作品，那么谁就会充分认识到，席勒正象康德一贯所做的那样，也把美同道德和政治严格地分开了。现在仅从大量的证据中举出论慷慨激昂一文，席勒在这里宣称，劝告作家们改编“民族题材”，是一种“蛮风”，他这样写道：“希腊的艺术趣味在它的作家的作品中如果只是通过历史关系取得的，那就糟糕了。”他还写道：“如果在美的事物中要求道德目的，那显然是界线的混淆，而为了扩大理性的领域，就会把想象力赶出它的合法的辖区。”席勒诚然曾经写过《论审美准则在道德上的运用》，但他在这篇文章中仍然严格地把美学和伦理学分别开来，以便贯彻这个普遍的观念，即美学教育对于人类的品德间接地产生有利的影响，这是一个老生常谈式的真理，所以席勒把这则小文作为补白发表在《时序》杂志上，却没有再收入他的散文集中。审美对象不是内容而是形式，康德的这条原理以如此简洁的文句出现在席勒的笔下：

“大师们真正的艺术奥秘在于，以形式消灭内容。”总而言之，如果说席勒的美学论文并没有篇篇达到康德的哲学深度，那么正因为他是诗人，他笔下的纯粹审美判断却往往比在康德笔下来得更丰富更鲜明。如果康德的美的理想使人很快想起文克尔曼的希腊轮廓，如果连莱辛“不得已时”都愿意迁就政府在艺术中抑制所有平凡卑贱的内容，那么席勒却在艺术中保障了平凡卑贱内容的合法权利。当然，他的意思是，丑与卑即审美观的极外围运用起来务必十分谨慎，而且须有一个崇高的艺术目的使之变得合理，但人们可不能因此过份鄙视穷措大；粪土为了粪土自身的缘故而要求艺术表现，这个辉煌的发现只是在我们这个开明的时代才得以产生的。

席勒在他的美学论文中也是根据资产阶级的理性权利来下

结论的，因此他并不落后于康德，倒是超越了康德。他不再是在“超感觉的基础”中，而是实事求是地在人们的历史局限性中寻求审美判断的可能性。不错，席勒也没有摆脱资产阶级启蒙学派的普遍偏见，认为他们所代表的运动是整个人类的启蒙，而不认为它只是属于某个时期，但是作为性如烈火的诗人，他却本能地拒绝康德美学理论中那一切死气沉沉的抽象。

席勒最重要的美学论著就是《关于人类美学教育的书信》。他开始发表这些书信时，给歌德写信说过：“我决不是为了诉说政治愁肠而提笔，我在这些书信中所说的一切，都是为了从此永远不再说到它们才说的。”实际上，“政治愁肠”对于席勒不过是为了一跃而进入美的理想的跳板，但是这个理想也正因此在历史上受到局限。我国古典文学的历史奥秘在这些美学书信中明晰地被揭示出来，可是这种明晰性今天仍然显得模糊不清，正如资产阶级历史学之谜的这个谜底一再可能被弄得一塌胡涂一样。

席勒一开始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之所以从事美学研究，正是因为“所有艺术品中最完美的一种，真正政治自由的建筑物”，在“人类伟大命运”被交到政治舞台上讨论的时刻，“提供了”一种“非常直接的兴味”，这是自称为人的人都有权参加的“伟大的诉讼”。他回答说，自然国家的腐朽结构诚然摇摇欲坠，然而宽宏大量的时刻却发现了一个麻木不仁的种族。大失所望的《强盗》作者是这样说的，但当席勒描述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毫无希望时，被法国恐怖时期吓破了胆的德国小市民却滔滔不绝地抢着发言了。席勒在“卑贱的、人数众多的阶级”身上发现了“粗野的、无法无天的本能”，不过他又补充道，“文明阶级”呈现了更其令人厌恶的垂头丧气的

景象，品性堕落的景象，那种堕落越来越使人愤慨，因为教养本身就是它的根源。

当然，在所有处于教化过程的民族中，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不过如果将今天和过去、特别是古希腊的人类形象加以对比，必须慎重行事。在诗人的慧眼面前，是展现了古代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差别的。在根本谈不上大工业、几乎没有手工业可言的德国，席勒写道：“永远只是被捆在整体的小破片上，人本身只是作为破片而形成的；永远只有他所驱使的车轮之单调的辚辚声在耳，他从未发展过他的天性的和声，他在性格中没有显示人性，只是变成了他的职业、他的知识的一个复本。”席勒在这方面决没有发出反动的悲叹。相反，他倒是说：“为了在人身上发展多样化的才具，除了使它们相互对抗外，别无他法。种种能力的这一对抗作用正是伟大的教化工具。”但是，席勒又补充道，也只是工具而已；只要这种对抗作用持续下去，我们就会逐渐走向文明。世界的整体通过人的能力的分隔培养收获了多少，个人在这个世界目的的诅咒下就会损失多少。“通过体育锻炼诚然可以造就运动员的体格，但是只有通过自由而均匀的肢体运动才能造就美。同样，个别智力的伸张诚然可以造就非凡的人，但是只有使所有智力得到同样的培养才能造就完美无缺的人。如果人性的培养需要作出这样的牺牲，那么我们对于过去和未来的时代又将是个什么关系呢？可以说，我们曾经是人类的奴隶，我们曾经为它从事奴役几千年之久，并将我们残废的天性深深打上了这种奴役的可耻的印记——因此后来的人类才可以在一种幸福的闲散生活中关照他们道德上的健康，并促进他们的人性的自由成长。”席勒在这里毫无顾忌地承担了资产阶级理性权利的后果，而资产阶